

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与华文传媒研究丛书

王列耀 主编

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 诗学考辩

杨匡汉 庄伟杰 著

Kuangshan Yang Weijie Zhua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与华文传媒研究丛书

王列耀 主编

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 诗学考辩

杨匡汉 庄伟杰 著

Kuanghan Yang Weijie Zhua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辨 / 杨匡汉, 庄伟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161 - 1188 - 8

I. ①海… II. ①杨…②庄… III. ①华文文学 - 文学研究 - 世界
IV. ①1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056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何又光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5
插 页 2
字 数 339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出版由暨南大学“211工程”第三期“比较文艺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建设项目资助；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资助

目 录

引言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第一章 海外华文文学的基本观念	(8)
一、文学思维的四度空间	(8)
二、知识谱系的诗学特征	(20)
三、学科之名与学理之弦	(28)
四、文化属性与身份认同	(37)
五、话语形态的叙述谱系	(44)
第二章 相近或相对的关键词	(60)
一、华文文学/华人文学	(62)
二、留学生文学/新移民文学	(66)
三、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理论	(71)
四、第三文化空间/他者的空间	(76)
五、流散/离散	(80)
六、家园意识/文化回归	(90)
七、自主性写作/唐人街情结	(97)
八、游牧/旅行	(101)
九、记忆/根性	(106)
十、东方主义/西方主义	(113)
十一、东西思维方式/东西文化差异	(118)
十二、三个华人世界/华人文化版图	(123)
十三、香蕉人/边缘人	(126)

· 2 · 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辨

十四、生存性/精神性	(130)
十五、地域性/世界性	(131)
十六、全球化/本土化	(134)
第三章 异同中互动的比较诗学	(138)
一、海外华文文学有别于中国文学的特质	(139)
二、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澳美欧华文文学之互见	(153)
三、域外汉字文化圈与海外华文文学之互联	(164)
四、美国华文文学与华裔美国文学之互涉	(172)
五、语种的华文文学与文化的华文文学之互训	(183)
六、差异理论与华文文学研究的会通	(190)
七、互动新景观：家园来去的“海归文学”	(199)
第四章 海外华文文学的美学形态	(208)
一、故园记忆与乡愁美学	(208)
二、空间位移与放逐美学	(221)
三、精神皈依与生命美学	(241)
四、时空穿梭与交错美学	(259)
第五章 海外华文文学的艺术方略	(274)
一、跨界叙说	(274)
二、母题的文本变奏	(290)
三、字思维	(305)
四、从妙悟到虚静	(312)
五、经典的回声	(323)
结语 以道观器	(332)
主要参考文献	(337)
后记	(340)

引 言

直挂云帆济沧海

我们曾几度来到南海之岸，凭窗而望，那灯光闪闪的海洋依旧，那汨汨作响的涛声依旧，还有不远处船上的点点白帆。帆影渐渐远去。这帆影，是属于长吟“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李白的；是属于放歌“欹帆侧舵入波涛”的杜甫的；是属于婉唱“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的李清照的；是属于渴念“不安的帆儿祈求着风暴”的“摩罗诗人”（鲁迅语）莱蒙托夫的。自然，也属于在《双桅船》中期待“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的舒婷的。星移斗转，春秋代序，这帆影，从此岸飘到彼岸，几乎飘进了每一个海内外华人的心灵之湖，凝聚成历久弥深的人情之岸。年复一年，翻过多少页命运之书，使我们确认，这一片片生命帆影，这一场场心灵风暴，使华人即使分离于东西，也不怕浪迹天涯海角。

临风遐想，“帆影”——“孤帆远影碧空尽”的帆影，不啻是一个象征。它牵出了中国人的半部移民史，也绣口一吐海外的华文文学。

历史上的移民，就中国而言，分为国内移民和海外移民。今日之中华民族，并非一个真正的民族概念，而是以汉族为主体、56个或者将来通过识别尚可能增加的民族的共同体。汉族及其前身华夏诸族，其形成，其扩展，都是通过移民过程而实现的。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开疆拓土，因有大规模的移民而巩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因有移民而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融合互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传播，因有移民此一活跃的载体而生生不息；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城市现代化，也因有移民的调节而增长生产能力和文化创造能量。

中国人向海外移民，始于19世纪中叶。最早以“望海谋生”的华人劳工为主体的移民潮，属苦力贸易阶段，走向有二：一是美洲，一是“南洋”——东南亚。下南洋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人口迁徙之一，鸦片战争之前，去东南亚谋生的华人已有150万之众；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欧美国家在我国东南沿海所招的“契约华工”（又称“卖猪仔”）约200万人；从1922年至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扬帆出洋的移民超过500万……那“飘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热”的辛酸，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在一百多年以来一波又一波的海外移民潮中，值得注意的是“留学”——流动游学现象。应当说，“移民”与“流动游学”的区别，在于移民主要是定居或以定居为目的，而留学对迁入地缺少一种归属感——“归属感”只有先留学、后定居才产生。

“留学”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是人口、更是人才的流动，是不同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人类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对于中国而言，最早派遣的留学生肩负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使命，容闳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名校耶鲁大学的中国学子，就持有“当使后予之人以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人文理想，推动了后来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实施。早期留学的原因实质上意味着作为弱国子民的知识贫困与落后。于是，不少人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陷于被言说、被解释、被界定的可悲境地。这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留学带来的副产品——出现了某种“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化”，接连不断的喧哗与骚动着双重文化人格的焦虑，影响至今。

然而，从推动中国文化思想现代转型，从海外华文文学发生学的角度看，“留学”的意义与贡献无法低估。胡适将“留学”比作摆渡西洋文明的“舟楫”与“篙师”；季羨林将“留学”比作“中国的普罗米修斯”；《联大八年》纪念册上所统计的179位名流、教授中，留学生达156名，占总数87%……他们带回（当然有些是“生搬”）西方先进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的新理念，如同现代化的报春花，为推动现代中国的文化进程立下了不世之功。

回溯一个多世纪的“留学潮”，大致经历了五代：第一代留学潮在1872年至1900年间，以容闳、詹天佑、茅以升等为代表，成为触发中

国近代化洋务运动的主力。其间一些大使级人物到欧洲各国，留下大量日记与游记，可谓开了旅欧华文文学之先河。第二代留学潮大致在1900年至1927年间，包括胡适、鲁迅、蔡元培、郭沫若、陈寅恪等留学生、庚款生和早期留苏学生。第三代留学潮主要指1927年至1949年间赴欧美的留学生，除勤工俭学的政治家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外，还有留学英国的老舍、许地山、朱自清、朱光潜、钱锺书、叶公超、王辛笛、凌淑华等人，留学法国的李金发、刘半农、苏雪林、巴金、傅雷、郑振铎、艾青、李健吾、戴望舒、张道藩等人，留学德国的宗白华、冯至、季羨林等人，不仅在他乡咏叹讽颂，学成归国更成为新文学建设的中坚。第四代留学潮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外派的留学生主要去向苏联和东欧，在国外学习工程技术和实用科学；而从台港地区“主动放逐”的留学生，主要走向欧美，其中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等文学素养甚高者，形成“留学生文学”之一大波。第五代留学潮则从七八十年代之交兴起，从1978年到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数达162万人，其中的文学人才，则促成了海外“新移民文学”的迅速生长。

在一代又一代的留学乃至移民潮中，作为人生悲欢、世相纷披、灵魂升沉的记录与印证，便是海外华文文学的鸣世。在远行的文化游子那里，或与龙虎共吟啸，或与花鸟共笑啼，纸上烟云化作了笔底波澜。“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自然成为一个庄重的知识命题。如果我们放开眼界，宽厚一点地看文学问题，那么，称以留学生文学为主导的海外华文文学乃中国五四新文学之滥觞，绝非戏言。事实上，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不是《狂人日记》，而是陈衡哲在留美时写的《一日》；鲁迅早于“五四”所写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学论文《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是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博览群书、凝思默想的独特成果；而胡适倡导“新诗革命”、“诗体解放”，也是在美国留学时期酝酿成就的，有《胡适留学日记》《非留学篇》可资佐证；冰心在大洋彼岸写的书信体散文结集《寄小读者》，以“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为主旨，成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前奏；作为中国现代自由诗奠基之作的《凤凰涅槃》，是郭沫若在日本游学时用两天时间一气呵成，奏响了凤凰更生之歌；它如郁达夫之于东瀛之怨的《沉沦》，徐志摩之于英伦酣醉的

《再别康桥》，老舍之于雾都世相和心理分析的《二马》，乃至林语堂之于用英文书写的《京华烟云》等等，也都是在羁旅异邦期间的作品，且被现代文学界列入经典。至于东南亚地区早期的华侨文学，受中国“五四”蕙风之影响而生长，却也以独特的“南洋色彩”，反哺和充实了“五四”新文学的内容。

随着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考辨的进展，我们越来越感悟到，人类总是使用自己意识世界的特殊编码，来认识周边的事物和考量的对象——就连我们的直觉和知觉都成为与现实世界的一个接口。不过，任何直觉和知觉不会独立使用既定的模型去理解与感知世界，只有翻开知识谱系，才能从现实中寻找与之相匹配的内容。于是，任何观察，都需要在相应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人类中的知识探求者是历史性的群体，我们任何人不能不被意识的历史性所左右。而世界又总是在不停地创造现实。同样，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文学，也在不停地创造多种多样的“现实”。由于成千上万的华人区分于不同地域、群体以至派别，作为生存方式和心灵状态之映现的文学，自然也不可能用唯一的和统一的标准去论衡——那不是缩短、而是扩大着和华人世界、和文学现实的距离。正因为如此，或许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说法更有道理：“我们应该准备随时重新考虑问题，随时准备勾销最珍爱的体系、所选择的事实或所谓事实的态度，假如进一步的研究要求这种改变的话。这不仅是由于发现或构成了新的事实，而且也是由于对存在的所谓事实进一步思考的结果。”

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实践中，我们也的确面对着许多存在的或新的事实，的确对遭遇到的一系列命题与概念需要做重新的思考，也的确需要对所选择的事实采取学理的态度。这些“现实”的问题有：

海外华文文学生成的有关历史条件，它所具有的特殊的意义内涵，内在的话语背景；

海外华文文学的异质性函数，以及这种异质性的构成；

海外华文文学的知识地形图，它的不同板块和不同的风貌；

海外华文文学静态的知识分类与非静态的知识变化；

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诗学与政治的关系；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理性，以及它所存在的知识的生长点；

海外华文文学与其他被命名的“文学”之间知识命题上的差异，即在此一谱系中被称为生死攸关的大命题而可能在别的谱系中属于不折不扣的伪命题；

海外华文文学所涉及的一些相关的现代性范畴（如“当代”、“传统”、“世界性”、“本土性”等）所具有的复杂的交错互动关系，其知识条件如何在语言和文化之间穿越往来；

海外华文作家需不需要有崇高精神的诗意之旅，需不需要保持一颗孑然不滓的纯美心灵，并对自身进行艺术的提升和认知的引领；等等。

上列诸项，进入海外华文文学的“知识网络”，为我们提供了林林总总、宏观微观的思考线索。然而，由于对象的“流散状态”和概念的“散状结构”，我们不必随之也运用发散式思维去东鳞西爪地操觚；相反，在“发散”的基础上，需要以收敛式思维，去抽取和提炼一些基础性、内在性、规律性的东西，以知识范型予以接近事物真相的把握。同样，由于对象的“时空交叉”和价值的“知识回流”，我们也不必随之成为西方“谱系学”的搬运工——其概念体系中的诸如“分离话语客体”、“摧毁认识主体”、反“推理实践”、反“连续性”、反“深层探索”等等，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并不足取；相反，我们可以认同杰姆逊所言“‘谱系’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消除关于所谓线性历史、‘阶段’论和目的论式的编纂史学的传统的理论顾忌”的合理性，进而以“问题”来带动研究，以“循环”来检视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的互动，对海外华文文学的一些话语、概念本身进行无顾忌的开放性阐释，在论述每一个核心范畴时，力求呈现问题的特点与起源、发展与流变，提示其生成语境与知识图景，并使之对问题的诗学考辩，具有超越性而上升到跨文化对话与交流的价值。

和文学创作一样，学术研究也要面对人群、社会、时代，也要建构意义世界。我们以海外华文文学为诗学考辩对象，以批判性反思进入“华文文学”之变局时，自然不能沿袭“西方冲击——东方回应”的思路，而是以“历史——文化——审美”的目光回首来路，会融新知，检点得失，选择海外华文文学进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重要现象、重要问题、重要观念，于知识谱系中将“经历”积聚为“经验”，将“事象”凝结为“命题”，采取横切竖排、交叉论证的结构模式进行述析。其

中,“基本概念”将对研究范围、学科特点、理论资源,作整体性、学理性的考量;“关键词”部分,着重考辨有关词语的内涵、界定、延异及应用,以理解与丰富表述系统;“不同区域的比较诗学”,则解读与论证“同中见异”的内涵与空间特征;“美学形态”力求拓展另有新境的审美化视界;而特别关注的“艺术方略”,对跨文化语境中的书写策略,也在知识层面上进行梳理与探悉。沿着考辩的理路,我们希望保持严谨厚实的特点,又兼具反思与创新的活力,旨在于浮世而见一些真精神。

坦率地说,我们没有构建一套完整的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知识体系的奢望——它尚处于潮流越过潮流、波浪跟着波浪、泡沫随着泡沫的运动过程中,同一阵风还有不同的声响,许多知识命题有待于敞开或开掘,一些抽象的东西也需层层剥开使之成为现实。但是,海外华文文学毕竟运行了一百多年,尤其是及至当代,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足以能引起和维持思想者强烈的感触,一些走向秩序的知识法则浮出历史地表并成为心灵的搏跳,一些行进中的云彩和风雨也可能上升至霹雳的境界。这样,我们自然有责任对这一领域若干重要命题做初步的考辩和诗学的论证,探其经纬,以启山林。

真心地说,我们也没有“整合”海外华文文学和“包打天下”的能力——它的“中”“西”之别和“同”“异”之辩,不时地发生着种种新变,需要研究者在复杂的面相和精确的总体中阐发精神的每一种创造,笔者显然才力不逮;然而,我们毕竟还有些知识积累,可以从“变”中看到一些“不变”的东西,从“动”中看到一些“静”的东西,从“散”中看到一些“聚”的东西,进而也获取一些求异证同的可能性。这样,我们自然有义务追随前贤,从谦卑做起,克服自身知识的不足,向常识求知,勉力接近和参与营造海外华文文学这一领域中的普适价值观念与崭新的知识体系。

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海外华文文学,其兴盛,其浑茫,其情意恣肆,其方面辽阔,已日见气象,形成一个从中心到边缘、再从边缘返回中心的循环运动。尽管世路多艰,文事多难,但多元文化的强烈诉求,已成为一股积极而活跃的社会话语与知识话语相交织的力量。此时此刻,我们不禁想起一千二百多年前李白的生命浩叹:

“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沧海，是水天一色的世界，是潮汐与共的巨卷，是兼收并蓄的圣殿。深信海外华文文学家们也会在持续的艰难探索中，以“沧海”为向往，直挂云帆，同舟共济，不断寻找新力和新知，驰向壮阔和渊深！

第一章

海外华文文学的基本观念

一、文学思维的四度空间

当我们环顾全球之时，或许会意识到，世界在运行中不仅相互依存，而且同频共振。即使你不向沧海驰去，沧浪也会向你逼来。

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时空，作为一种特殊文化景观的海外华文文学，与人们的价值观念、文化形态、存在方式相适应，也必然会展现自身特殊的思维空间，特殊的“以道观物”的思维向度，特殊的“闪亮登场”的思维视阈。

可以说，正是由于以下四种海外华文文学思想的四度空间的展现，使我们的考辩对象变得更加通明透亮，也为我们把握对象时提供一个必要的认知前提和诗学依据。

（一）汉语思维的空间

语言是人类的家园。语言和世界同构。在这个地球上，人类和世界的关联往往表现在我们的语言里。而每一种语言，都有与之对应的人类群体——“语种”，也因此而成为符号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纽带。

“语种的华文文学”这一概念，从逻辑上看似乎有语义重复之嫌，但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自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或者说，从海外华文文学一开始其实就已经潜在，因为是语言（形式），才生出文学创作及其研究。如果没有语言（种），海外华文文学就不可能存在。诚然，华人用不同的语言书写和表意，产生的文学形态自然是不同的。按常理来说，用汉语（母语）书写的（作品），我们才能称之为华文文学；而用英语书写的，只能称之为“英语文学”。面对着华人用

不同语言（包括母语）进行创作的作品，我们只能统称为“华人文学”，或者，把华人用非母语书写的作品，命名为“华裔文学”。之所以有这么多相互纠结缠绕的、甚至是说不清、理还乱的问题，是因为这当中不仅首先跟语言有关，还跟文化与族性相关。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海外华文（语）文学与世界上各地存在的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俄语文学等是各自独立并存的关系的话，那么，海外华文文学首先应该是一种语言的华文文学，其次才是文化的华文文学，当然，作为一个民族的语言，它也是民族（族性）的华文文学。

散居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用文学的特殊形式来表现自我认同，本身就是对自身文化的认同，而“语种的”义不容辞地承担着这一母体文化的情感意蕴。旅美作家陈若曦说，汉语就是我的家。另一位旅美作家严歌苓在《母体的认可》一文中，深有感触地道出心声：“在异国以母语进行写作，总使我感到自己是多么边缘的一个人。而只有此刻，当我发现自己被母语的大背景所容纳、所接受；当我和自己的语言母体产生遥远却真切的沟通时，我才感到一阵突至的安全感。”^①的确，用自己的母语在非母语的异质土壤上来表达自己、寻找自己的心灵归宿和情感源流，就是走进并且拥有自己所喜欢的世界。从根本上说，华文文学在海外当属于一种跨越文化经验的写作。作家对“自我”的定位，是取决于一个人站在何种立场，选择何种姿态，采取何种叙述形式及语言来表达人生情感和经验的决定性因素。譬如，在留学生/新移民作家那里，之所以拥有独立自足的精神空间，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们所带来的一种新的叙述语言的空间。作品的语言空间可以为读者创造出艺术想象的空间，其建立，不仅体现在作品词语的驾驭和题材适应范围的变化与扩展上，还依赖于作者对世事人情的洞察和看法所采用的不同特殊视角和方式。对这些方式和视角的表达，要求作者能够用新鲜的语言形式，在颇富张力的语词和结构形式中为读者带来新的审美经验。可以断言，对一个有思想有深度的海外华文作家来说，语言功力是最重要的素质，缺乏或不具备驾驭语言的这种天赋或才情，就无法创造和拥有自己的语言空间，更不可能让自己的作品走向最佳的艺术境界。严歌苓的《人

① 严歌苓：《母体的认可》，《中国时报》1998年3月30日。

寰》之所以富有魅力，在于作品中充分展现她驾驭母语而形成的独特的语言风格。小说使用了心理学“说出来”（talk-out）的方式，循序渐进，步步为营，在一种开放和商讨的语言氛围中，探寻生命个体本质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其本身就是通过独特的语言方式对“自我”本质的一种寻找和发现，一种“让文学讲汉语”的文心和诗道。

在汉语思维的言说空间，新移民文学还表现在作家对他们笔下的形象和感情表达的丰富性上，那些鲜活的人物已经不再是传统文本里的一张张思乡而显得疲惫不堪的脸庞和一个个愁眉莫展的无家游子，而是一群活生生且多样化地存活在西方社会中的华人形象，这就是作家语言叙述空间所产生的有效性即语言效应。正因为如此，作家便能站在新的角度和姿态上，解读传统，面向世界，审视自我。尤其是进入全球化语境中，“文学的越界已成为一种大趋势，语种的文学现象实际上是文学全球化的一个鲜明的表征。因此语种文学显然比以往更有纳入文学研究概念家族和阐释视域的学理依据和讨论之必要”^①。至于有的学者提出不要因为语种的限定而忽略海外华人华裔的非汉语写作的作品和文学现象，我们以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正如一把扇子，一面写着中文或画着中国画，另一面写着英文或印上西洋油画，无论是谁是哪方人士（不同种族），哪怕都是出自华人之手，但它毕竟存在于两个扇面之上，它们两者可以对应互补，但不可混为一谈。诚如东方与西方同在一个地球，但毕竟无论在地理时空、文化时空等方面看，都是有所差别相互独立的（存在），但两者可以彼此交流互动。当然，作为研究者，你完全可以对两个扇面进行欣赏评价，或比较、或解读、或说出你的看法。如果以上蹩脚的比喻有一定的说服力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加拿大华人学者梁丽芳的《扩大视野：从海外华文文学到海外华人文学》呼吁的缘由，乃是表明在“扩大视野”上。应该说，当梁氏提出的华人的非汉语写作与华文写作并存是一种事实，无可争辩。如果从族性视角来说，两者的确可以并行同步研究；从文化视角，可以交叉比较研究；从语种视角，当然必须区别分开研究；从个人化写作视角，则可以以个

^① 刘登翰、刘小新：《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见《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案方式（包括作家与文本）进行研究；倘若从边缘性视角观照，的确如梁氏所言：“他用的边缘性却成为华裔发声、自我肯定、反抗强势控制、重建本身族裔历史的场域。”^①如此说来，只有当我们看到问题的两面性甚至因多重视角而带来的不同方法时，才能理顺其中的本质区别和存在的差异。倘若从单一视角看问题，就容易出现偏差及另一种局限。如果我们一厢情愿，总认为应该把华人的非华文书写硬拉带扯连同华人的母语写作（华文文学）合并在以“华人文学”来命名的范围里，同样无法有令人满意的回答和充足的学理依据。道理很简单，因为华人文学根本不足以对华文文学实行有效的全面覆盖，正如华文文学并非简单地包含于华人文学。理由何在？如果我们站在现代新文学的视野加以考察，便可发现，非华人作家的华文书写同样不可忽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韩国的许世旭等一些用华文书写的作家，是不能小觑的。如果我们只顾及华人的非汉语写作，而放弃了非华人的汉语写作，似乎没有多大的必要。因此，同样值得质疑。“这样简单化处理或是策略性排除，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悖论的事实：当我们向华人外语文学开放边界时，却顾此失彼地将非华人的汉语写作拒之门外。”^②关于这个问题，所牵涉的面较为广泛，毕竟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学形态（系统），因为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语言不同，作者的思维、表达文本的内涵以及读者指向都大异其趣，包括其中所表现的文化身份、文化内蕴、文化解读等。诚然，在全球化语境下，如果从后殖民理论中流散写作的视角切入，对华人的非汉语（外语）创作与华人的华文创作进行比较研究，即打破华文文学自设的“语种”限定，开放边界，或许有利于我们认识华人在双重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文化选择，有助于我们找到一条打通多元文化如何交汇相融、并存共生的经验之路，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和认识海外华人文学和东西方文化。

可以说，作为世界上一个古老民族语言的汉语，是一个独立的符号表述体系。“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华文”，就表明文学与生活的境遇，

① 梁丽芳：《扩大视野：从海外华文文学到海外华人文学》，转自加华作家作品选《白雪红枫》，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2003年版，第281页。

② 胡贤林：《范式转换还是学科重构？》，见《华文文学》2007年第5期。